

20世纪 中国古典文学 学科通志

第2卷

编写指导 徐公持
主 编 刘敬圻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04AZW003）

20世纪

顾问 傅璇琮 徐公持
特聘编写指导 徐公持
主编 刘敬圻
副主编 张安祖

中国古典文学学科通志

第2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学科通志. 第 2 卷 / 刘敬圻主编.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328-6300-6

I. ①2…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概况—20 世纪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3531 号

20 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学科通志

第二卷

主编 刘敬圻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0531)82092663 传真: (0531)82092663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行者: 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mm × 1230mm 32 开本

印 张: 22.875 印张

字 数: 552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6300-6

定 价: 66.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539—2925888

目
录

-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
- 刘师培、黄节、黄侃等的古典文学研究
- 学衡派与中国古典文学
-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及其他古典文学研究(上)
-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及其他古典文学研究(下)
- 文学研究会与古典文学研究
- 清华研究院在古典文学学科史上的地位
- 一二十年代的文学史写作(上)
- 一二十年代的文学史写作(下)
- 20年代的古典文学专业书籍和专业刊物的出版
- 30年代以前的文学古籍整理
- 唯物史观进入古典文学学科的滥觞
- 30年代的“新”中国文学史
- 30年代的“旧”中国文学史

30年代“唯物史观文学史”的兴起
分体文学史在三四十年代的发达
吴梅及其弟子的词曲研究
陈寅恪的古典文学研究
闻一多的古典文学研究
朱自清的古典文学研究
钱锺书的《谈艺录》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
朱光潜的古典文学—美学研究

参考文献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

《白话文学史》的写作始末及时代背景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自序》中介绍了该书的写作始末,该书是由《国语文学史》修改而成,《国语文学史》是胡适在国语讲习所讲国语文学史时所编讲义。

民国十年(1921年),教育部办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要我去讲国语文学史。我在八星期内编了十五篇讲义,约有八万字,有石印的本子。

《国语文学史》共十五讲,第一讲为我为什么要讲国语文学史呢?第二讲为古文是何时死的?第三讲至第十五讲从汉朝的平民文学始,结至南宋白话文。^①

1922年3月23日,胡适到天津南开大学演讲,当晚在旅社将《国语文学史》进行修改,删去一部分,归并作三编:第一讲为汉魏六朝的平民文学;第二讲为唐代文学的白话化;第三讲为两宋的白话文学。胡适对此修改感到不满意,次日在旅馆里又拟出新纲目,由“引论”、“二千五百年前的白话文学——国风”、“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是白话的吗”、“汉魏六朝的民间文学”、“唐代文学的白话化”、“两宋的白话文学”、“金元的白话文学”、“明代的白话文学”、“清代的白话文学”、“国语文学的运动”十

^① 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部分组成。但此修改计划并未付诸实施。

重作《国语文学史》的志愿遂一搁六七年,中间十一年(1922年)暑假中我在南开大学讲过一次,有油印本,就是用三月中我的删改本,共分三编,除去了原有的第一讲。同年十二月,教育部开第四届国语讲习所,我又讲一次,即用南开油印本作底子,另印一种油印本。这个本子就是后来北京翻印的《国语文学史》的底本。^①

民国十六年(1927年),北京文化学社将《国语文学史》排印出版,有黎锦熙序,但此次出版并未经过胡适同意。胡适得知后觉此书尚不适合出版,但既已出版,又不便责备友人,遂决心修改。

不过拿这种见解不成熟,材料不完备,匆匆赶成的草稿出来问世,实在叫我十分难为情。我为自赎这种罪过起见,遂决心修改这部书。^②

《白话文学史》于1927年写成,1928年由新月书店出版。该书原计划分上、中、下三卷来写,但只完成了上卷,且只有汉代到中唐的白话文学史部分,唐代也只谈到韵文部分。胡适曾声明“这部文学史的中下卷大概是在一二年内继续编成的”^③,但最终并未践守诺言。《白话文学史》与此前的《国语文学史》已经大为不同。

原稿十五讲中,第一讲(本书的“引子”)是早已删去了的(故北京印本《国语文学史》无此一章),现在却完全恢复了;第二讲稍有删改,也保留了;第三讲与第四讲(北京印本的第二章第三章)保存了一部分。此外便完全不留一字了。^④

^{①②③④} 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白话文学史》相比于《国语文学史》，内容要详细得多，吸收了1921—1927年间新发现或新整理的许多重要史料，观点方面也有若干变动。^①

《白话文学史》及其前身《国语文学史》都是在新文学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正如陈平原所说：

胡适的文学史著述，大都酝酿于文学革命运动时，成形于整理国故思潮中。^②

胡适1917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学改良刍议》，标志着新文学运动的开始。新文学运动提倡白话文，胡适不遗余力地鼓吹。1917年5月写成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说：“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1918年4月又作《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进一步明确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此前维新派为了开启民智，曾提倡白话文。经过新文学运动发起者的努力，1920年各大报刊改用白话，教育部颁令改用国语，白话文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是，反对白话文的声音始终没有间断，因而《白话文学史》不是单纯的学术著作。胡适在《白话文学史·引子》中提出两点：

第一，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很光荣的历史的。我要人人都知道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国语文学若没有这一千几百年的历史，若不是历史进化的结果，这几年来的运动决不会有那样的容易，决不能在那么短的时期内变成一种全国的运动，决不能在三五年内引起那么多的人的响应与赞助。

① 骆玉明：《关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见胡适《白话文学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②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22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第二,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个什么地位。老实说吧,我要大家都知道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

黎锦熙在为《国语文学史》所作的《代序》中说:“这是‘文学革命’之历史的根据,或者也含有一点儿‘托古改制’的意味。”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的写作目的被后来的研究者们明白地揭示出来:

他的《白话文学史》及其前身《国语文学史》,又是他开展白话文运动中的一个具体而重要的步骤。因此,它们不仅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著作,毋宁说相反,是为他提倡白话文学从而开展新文学革命的宏大目标服务的一种革命行为。^①

《国语文学史》和《白话文学史》是学术著作,却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著作,它明显带有工具色彩,目的在为作者胡适所倡导的白话运动服务,是作者推行白话运动有机的和重要的组成部分……^②

胡适写《白话文学史》,其目的不仅在于中国文学史,更重要的是以此为手段替“五四”白话新文学运动寻找历史的“证据”,以正本清源,提高人们对白话文学地位的认识,进一步推动新文学运动的深入。^③

《白话文学史》的特点

①② 刘石:《关于胡适的两部中国文学史著作》,北京:《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③ 魏崇新,王同坤:《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观念的研究》,第82页,北京:西苑出版社,2002年。

一、历史进化的文学史观

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说：“居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①《文学改良刍议》中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②“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这一说法并非胡适所发明，但胡适不同前人之处在于他认为每一时代的文学都胜过前代。

胡适《白话文学史》以前的文学史著作都是以古文传统为中国文学史正宗或中心，而胡适的历史进化的文学史观则认为“这一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是古文文学的末路史，是白话文学的进化史”③。

1935年，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对他所提出的新的文学史观颇为得意：

我们在那时候所提出的新的文学史观，正是要给全国读文学史的人们戴上一副新的眼镜，使他们忽然看见那平时看不见的琼楼玉宇，奇葩瑶草，使他们忽然惊叹天地之大，历史之全！拿《水浒传》、《金瓶梅》来比当时的正统文学，当然不但何、李的假古董不值一笑，就是公安、竟陵也都成了扭扭捏捏的小家数了！拿《儒林外史》、《红楼梦》来比方、姚、曾、吴，也当然再不会发那“举天下之类无以易乎

① 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②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③ 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桐城姚氏者也”的仓陋见解了！所以那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初看去好像貌不惊人，此实是一种“哥白尼的天文革命”：哥白尼用太阳中心说代替了地中心说，此说一出就使天地易位，宇宙变色；历史进化的文学观用白话正宗代替了古文正统，就使那“宇宙古今之至美”从那七层宝座上倒撞下来，变成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这两个名词是玄同创的）！从“正宗”变成了“谬种”，从“宇宙古今之至美”变成了“妖魔”、“妖孽”，这是我们的“哥白尼革命”。①

与此文学史观相联系，胡适提出“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将白话文学史等同于中国文学史。为此，胡适扩大了白话文学的范围。

我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得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我从前曾说过，“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②

二、“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

胡适在提出“这一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是古文文学的末路史，是白话文学的进化史”的假设后，在《白话文学史》中进行了“小心的求证”。这一方法使得胡适重视考据。由于手头缺少相关书籍，《白话文学史》便不曾从《三百篇》做起。敦煌材料的发现对他的文学史写作也有很大的影响：

六年前的许多假设，有些现在已得着新证据了，有些现在须大大地改动了。如六年前我说寒山的诗应该是晚唐的产品，但敦煌出现的新材料使我不得不怀疑了。怀疑便引

①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

② 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我去寻新证据,寒山的时代竟因此得着重新考定了。又如我在《国语文学史》初稿里断定唐朝一代的诗史,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渐白话化的历史。敦煌的新史料给我添了无数佐证,同时却又使我知道白话化的趋势比我六年前所悬想的还要早几百年!我在六年前不敢把寒山放在初唐,却不料隋唐之际已有了白话诗人王梵志了!我在六年前刚见着南宋的《京本通俗小说》,还很诧异,却不料唐朝已有不少的通俗小说了!①

三、选录大量文学作品

据学者统计,《白话文学史》“全书选三百一三例,其中文十一例,赋二例”②。胡适自己也说:

我这部文学史里,每讨论一人或一派的文学,一定要举出这人或这派的作品作为例子。故这部书不但是文学史,还可算是一部中国文学名著选本。③

对此,胡适的解释是:

文学史的著作者决不可假定读者手头案上总堆着无数名家的专集或总集。这个毛病是很普遍的。西洋的文学史家也往往不肯多举例:单说某人的某一篇诗是如何如何;所以这种文学史上只看见许多人名、诗题、书名,正同旧式朝代史上堆着无数人名、年号一样。这种抽象的文学史是没有什么趣味的,也没有多大实用的。④

四、对佛教翻译文学的重视

专设第九、第十两章谈佛教的翻译文学,佛经被大段引入书中,作为白话文学的历史依据之一。

另一方面是原来说法布道的本意,六朝以下,律师宣

①③④ 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② 徐雁平:《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第162~16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讲,禅师谈禅,都倾向白话的讲说;到禅宗的大师的白话语录出来,散文的文学上遂开一生面了。^⑤

五、提出一些新观点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自序》中说:“这部书里有许多见解是我个人的见地,虽然是辛苦得来的居多,却也难保没有错误。”下面把这些见解分条列出。

1. “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这是文学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这条通例。”^⑥

2. 建安文学的主要事业在于制作乐府歌辞。“这个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文学运动,它的主要事业在于制作乐府歌辞,在于文人用古乐府的旧曲改作新词。”^②

3. 故事诗起来的时代是在建安、泰始之间(200—270年)。“有蔡琰的长篇自记诗,有左延年与傅玄记秦女休故事的诗。此外定还有不少的故事诗流传于民间。例如乐府有《秋胡行》,本辞虽不传了,然可证当日有秋胡的故事诗;又有《淮南王篇》,本辞也没有了,然可证当日有淮南王成仙的故事诗。故事诗的趋势已传染到少数文人了。故事诗的时期已到了,故事诗的杰作要出来了。”^③

4. 佛教文学发生之晚与“唱导”、“梵呗”的方法的重要。“佛教盛行如此之晚,故译经在中国文学上发生影响也更晚。四五世纪的中国文学可说是没有受到佛经的影响,因为偶然采用一两个佛书的名词不算是文学影响。佛教文学在中国文学上发生影响是在六世纪以后。”^④

5. 白话诗的四种来源。“这四项——民歌、嘲戏、歌妓的引

^⑤ 胡适:《白话文学史》,第15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⑥②③④⑤⑥} 胡适:《白话文学史》,第17页,第42页,第63页,第142页,第156页,第160~177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诱、传教与说理——是一切白话诗的来源。”^⑤

6. 对王梵志与寒山诗的考证。^⑥

7. 李杜优劣论。“然而我们凡夫俗子终不免自惭形秽，总觉得他歌唱的不是我们的歌唱。他在云雾里嘲笑那瘦诗人杜甫，然而我们终觉得杜甫能了解我们，我们也能了解杜甫。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则终于是‘天上谪仙人’而已。”^①

8. 天宝大乱后的文学特别色彩说。“开元、天宝是盛世，是太平世；故这个时代的文学只是歌舞升平的文学，内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八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是个乱离的社会；故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呼号愁苦的文学，是痛定思痛的文学，内容是写实的，意境是真实的。”^②

9. 对卢仝、张籍的特别注重。论述张籍、卢仝的诗歌用了很长的篇幅，认为：“张籍的天才高，故他的成绩很高。他的社会乐府，上可以比杜甫，下可以比白居易。元结、元稹都不及他。”^③“卢仝的特别长处只是他那压不住的滑稽风趣，同他那大胆尝试的精神。”^④

《白话文学史》的影响

《白话文学史》出版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的一些文学史的写作受到胡适的文学史观、研究方法、文学史通例、文学作品的大量选入、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定位与评价等的影响。“在20年代至40年代末这一历史时期内，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

^{①②③④} 胡适：《白话文学史》，第206页，第219页，第278页，第29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域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⑤

陆侃如和冯沅君合著的《中国诗史》,“于唐代以后,元代以前,只叙词而没有诗;元代以后只叙散曲,诗和词都没有了。著者认为唐以后的诗,宋以后的词,都是‘劣作’,所以应该‘人取我弃’”。“著者以打破格律和运用方言俗语为诗体进步的形式主义观点,以及认为曲胜于词而且超过以往时代的‘文体进化论’观点,都显然表现着胡适的影响。”^⑥

胡云翼 1932 年出版的《新著中国文学史》显然也受到胡适的文学史观的影响。“于历代正统文学仅在综述中概而论之,甚至一笔带过,而对‘大众文学’则娓娓细说。如于唐则详于诗歌,于宋则详于歌词,于元则详于戏曲,于明则详于小说,于清亦然。‘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在书中得到了彻底的贯彻……”^⑦

自《白话文学史》出版后,白话文学及与之相关的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受到了重视。周作人于 1932 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说道:“影响中国社会的力量最大的,不是孔子和老子,不是纯粹文学,而是道教(不是老庄的道家)和通俗文学。因此研究中国文学,更不能置通俗文学于不顾。”^⑧

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1938 年出版)第一章中谈到俗文学与正统文学的关系时说:

许多的正统文学的文体原都是由“俗文学”升格而来

⑤ 魏崇新、王同坤:《20 世纪中国文学史观——观念的演进》,第 81 页,北京:西苑出版社,2002 年。

⑥ 余冠英:《胡适对中国文学史“公例”的歪曲捏造及其影响》,北京:《文艺报》,1955 年第 17 期。

⑦ 刘翔翔、李露蕾:《胡云翼重写文学史·前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

⑧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 15 页,北京:人文书店,1932 年。

的。像《诗经》，其中的大部分原来就是民歌。像五言诗原来就是从民间发生的。像汉代的乐府，六朝的新乐府，唐五代的词，元、明的曲，宋、金的诸宫调，哪一个新文体不是从民间发生出来的。

当民间发生了一种新的文体时，学士大夫们其初是完全忽视的，是鄙夷不屑一读的。但渐渐的，有勇气的文人学士们采取这种新鲜的新文体作为自己的创作的形式了，渐渐的这种新的文体升格而成为王家贵族的东西了。至此，而它们渐渐的远离了民间，而成为正统的文学的一体了。^①

这段论述显然祖述胡适《白话文学史》中关于“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的说法。胡适认为“这是文学史的通例”。这一通例说对后来的文学史著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此，研究者多有论述。

30年代以后国人所撰文学史著，或多或少或明或暗都受到胡适描述的所谓“文学史通例”的制约。就连鲁迅、郑振铎两位大家的研究思路，也打上了这一印记。鲁迅30年代称：“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而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第一章描述“俗文学”和“正统文学”的互动关系时，基本上照抄胡适的说法，将民间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原动力。这一颇有新意的假设，到50年代演变成为“民间文学主流论”，越来越暴露其理论缺失。^②

①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2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

②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20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30年代的文学史著作受胡适《白话文学史》的影响,还表现为选录大量的作品。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中,“作家共计约有二百七十余人,作品有四百三十余篇。若分而读之,一则可当作历代的文学家的传略,一则可当作历代的纯文学的选粹”^①。

胡适对一些古代作家作品的评价也影响了一些文学史著作。“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1938年出版)称《僮约》为‘很有趣的俗文学’,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1931年12月出版)、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1941年1月发行)都将王梵志和王绩并提。刘大杰且认为王梵志的‘吾有十亩田’等思想内容和语言艺术都毫无可取的诗是‘从朴质浅显中能表现出真情实意’的‘好诗’。既然将白话的作品故意抬高,另一面必然是将比较难懂的作品极力贬低,所以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1930年10月出版)就说杜甫的《秋兴八首》‘雕炼过度,不是好诗’,而把这些诗中的忧时爱国的极其深厚的思想感情一笔抹煞了。这分明也是胡适式的偏见。”^②

刘大杰于194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是一部优秀的文学史著作,但同样明显地受到胡适《白话文学史》的影响。“从《白话文学史》出版到《中国文学发展史》写成,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十多年之后,刘大杰仍然在表现出对胡适的文学史权威的确认与维护——或引据其观点,或因袭其方法,或照搬其原文——一方面,是确认与维护胡适按照写实原则遴选的文学史经典,另一方面,也是确认与维护胡适采用写实方法对这些文学史经典所作的诠释。”^③

① 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之编者例言,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

② 余冠英:《胡适对中国文学史“公例”的歪曲捏造及其影响》,北京:《文艺报》,1955年第17期。

③ 戴燕:《写实主义下的文学阅读》,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2期。